

从甲午战争看清末中日国防动员差距

■王世枚



巨大的国防动员差距,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124年前的7月25日,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中国北洋海军舰艇发起突然袭击,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拉开帷幕。在这场事关国运的关键性战争中,中方投入总兵力63万人,日方投入总兵力24万余人,战争的结果却是63万输给了24万,中国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。

100多年来,痛定思痛的国人一次次把甲午战争放到历史的手术台上,用深刻反省的手术刀一遍遍解剖战败原因,从国防战略、战役、战术、装备等多角度探究悲剧背后的病灶,种种答案不胜枚举。然而,无论如何,国土面积相当于对手30多倍的中国,竟然输给了日本。这一明显违背综合国力估算和战争潜力较量的现象,反映出的是中日两国在国防动员方面的巨大差距,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。

三心二意与蓄谋已久的战前准备差距。如果把甲午战争的中日战争动员较量比作一场接力赛,中国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在战争爆发之前,清政府上下安于“太平盛世”,总幻想着距离下一场战争很远。直到战争爆发前,清廷对日军的战争准备和军事行动情况几乎一无所知,更没有认真准备。经远舰管驾二副陈京莹在来信中披露,“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战,而南洋及各省差船,不特无操练,且船如玻璃”。在日本磨刀霍霍,蓄意挑起战争的危急关头,身为清朝重臣的李

鸿章仍不做军事准备与战前部署,竟然抱着“我不先与开仗,彼不动手,此万国公例,谁先开战,即谁理直”的天真想法,耽误了宝贵的备战时间。由于准备不足,致使清军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。反观日本方面,在甲午战争前,日本前后8次实施了《扩充军备案》。战前几年,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%以上,1892年更是高达41%。战前,日本陆军扩充到7个师团、总人数10余万人;其海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的素质,都赶上甚至可以说是部分超越中国,扎实做好好了与中国进行“国运相赌”的战争准备。

低效无能与高效运转的作战决策差距。从战争开始到结束,清朝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战争组织体制,战争决策靠传统的廷议制度,主战派、主和派相持不下,政治体制和政权运转方式根本不适应战时决策需求。而日本战前就组建了由天皇主持的战时大本营,实行一元化垂直战争组织体制,下设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,统一协调指挥陆海军作战,战时运行十分顺畅高效。日方战略层面虽然是豪赌,决策指挥上却精心编作作战预案,甚至做好了海战失利、清军攻击日本本土的最坏打算。从中日国力消耗的角度看,如果甲午战争再坚持几个月,最先垮掉的说不定是日本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承认:“国内海陆

军备几成空虚,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、军需等,均告疲乏。”曾与邓世昌、林永升等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严复曾公开上书,提出与日本打持久战的建议,“十年二十年转战,以任拼与贼倭寇没尽而已”。奈何清廷既没有认真的战略规划,更无法保持承受挫折的定力、战斗到底的勇气,在挫折面前成了惊弓之鸟,很快选择了投降路线。

粗放混乱与认真细致的战争组织差距。纵观甲午战争全程,清军的战争组织和实施,从指挥机构的组建、作战计划的制订,到战时兵员扩充、兵力调动部署、军需前运后送,都非常混乱、毫无章法。以兵员扩充为例,当时中国约有4亿人口,而日本大约只有7000万,中国的总人口和适龄兵员数量都远远大于日本。但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兵制度,军中老中青混杂不说,吃空饷更是司空见惯,战时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。更糟糕的是,这些新募的乌合之众往往没有经过临战训练即开赴前线,既不懂作战技巧,更没有作战勇气,一碰到日军就蜂拥而退。日军方面,早在1873年就颁布了《征兵条例》,规定所有适龄男性均有服役的义务,并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常备兵役和预备兵役制度,日本战时扩充的兵员绝大部分都是曾服过现役、预备役和后备役的老兵,战时只需经过短时的恢复性训练即可形成有效战斗力。另外,由于缺乏战时组织能力,清

军虽然人多势众,战场上却基本是各自为战,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和协同。日军进攻辽东兵力不到5万人,清军调集的援军先后有十几万人,但体系庞杂、多头指挥、互相观望、各不相救,一仗接着一仗败。威海卫之战中,防守威海军港和要塞的都是李鸿章的北洋系统部队,但同属北洋派系的陆海军将领却各行其是、互不协同,结果陆上防御很快溃散,炮台尽失,陷北洋水师于绝境。诗人黄遵宪痛心而泣:“海陆军,人力合,我力分!”

麻木不仁与兵民一体的民力动员差距。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指出,民众力量既是战争的人力源泉、物力源泉,又是战争的精神源泉;尽最大努力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,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。清政府长期实行愚民政策,对于民众的战争动员也是无从谈起。底层民众对战争漠不关心,更不会支持战争。当甲午战争硝烟弥漫之际,中国不但南方歌舞升平,即使在战火蔓延的北方,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生计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争取民众对战争的支持。开战后,日本开动传媒机器传播所谓“朝鲜独立论”“义战论”“文野之论”“中国意味落后论”和“日本人优越论”等,大肆制造“战争有理”的舆论氛围。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,随时传递前线最新战报。国内掀起捐款热潮,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大量金钱财物。日本1.5亿日元临时军费预算中,1亿日元额度以发行军事公债形式向社会筹集,结果是两次组织公债募集活动均超额完成任务。日本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,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。不得不承认,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如一盘散沙,小小的日本却动员起全体国民的力量参战,这也是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(作者单位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)



原典

假痴不癫,是指内心清醒表面却伪装成痴呆状,隐藏行踪。如《六韬》中所说:“鸷鸟将击,卑飞敛翼;猛兽将搏,弭耳俯伏;圣人将动,必有愚色。”后泛指用假象来欺骗、迷惑和引诱他人。

三十六计中,此计原文为“宁伪不知不为,不伪作假知妄为;静不露机,云雷屯也”,即宁可装作糊涂而不去行动,也不可冒充聪明而轻举妄动,要不露声色地筹划计谋,就像冬季云雷屯聚在一起,积蓄力量伺机而动。引申到军事上,是指在形势不利于己时,要设计伪装笨拙,想方设法蒙蔽敌人视听,使自己行动不被敌人洞察,而后暗地里积极准备,等待时机,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,是一种麻痹对手、待机而动的谋略。

古代战例

秦朝末年,匈奴内部政权变动,人心不稳。匈奴邻近民族东胡借机向匈奴勒索。东胡先要匈奴献上国宝千里马,然后又要匈奴单于冒顿一名妻妾。匈奴的将领们气愤不已,冒顿却若无其事,一再退让,东胡从此不再把匈奴放在眼里。不久,东胡又索要匈奴交界的一片茫茫荒原,众将以为冒顿恐怕又要答应割让,岂料冒顿怒道:“匈奴国土,怎可随便让人?”随后下令进攻东胡。匈奴将士早已按捺不住,个个奋勇争先。东胡王做梦也没想到之前貌似痴愚的冒顿会突然发兵攻打自己,毫无准备仓促应战,东胡很快被灭,东胡王被杀于乱军之中。

现代战例

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中,预定登陆地点奥马哈与犹他两个海滩之间有一个突出的奥科角,卡住了盟军的进攻路线。那里的悬崖直上直下有30多米,易守难攻,盟军的情报还显示那里部署有6门155毫米火炮,将会对盟军登陆舰队造成极大威胁。盟军于是决定在登陆发起前半小时派出游击部队发起偷袭,消灭这6门火炮。由于前往奥科角途中,遇到了登陆艇漏水淹死队员,跑错路线等意外情

况,游击兵部队在登陆发起时才抵达奥科角。游击兵们利用钢爪爬上悬崖,一番激战攻下奥科角后,发现所谓的6门火炮其实是电线杆伪装的,真正的火炮早已转移。由于援军调往他处,游击兵部队孤军奋战,打退纳粹德军多次反攻,200多人最后只剩不到90人。而6门真正的火炮,是这批游击兵的幸存队员在随后的侦察中,于1.5公里外的一个苹果园内发现。游击兵们最终还是摧毁了这6门火炮。

计谋分析

以上两个战例,冒顿巧设“痴”局,在实力不够强大、时机不够成熟时,故意制造出匈奴羸弱无能的假象,使东胡王放松警惕,待匈奴兵强马壮之时,发起反击;纳粹德军则反其道而行之,用精心伪装的“巨炮电线杆”大做文章,迷惑了美军,隐藏了自身实力,使美军付出了很大代价。当然,两个战例又略有不同。匈奴灭东胡属于“大智若愚”,即在环境不利于己的情况下,为避敌锋芒,保护自己,采取装疯卖傻、装聋作哑的办法等待时机;而德军电线杆充炮守海滩属于“愚兵必胜”,即在作战中,想办法蒙蔽敌人的视听,不让敌人了解我方的意图。可见,对于“假痴不癫”这一谋略的实践运用,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“假痴不癫”之计,对指挥员心理素质要求极高,只有沉着镇定、不为一时得失所左右的指挥员才能运用好这一计谋。想要运用、防范并破解好此计,指挥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:

一是指挥员要有逼真的“表演”艺术。假痴不癫,重点就在于一个“假”字。“兵者,诡道也”。凡成功的军事行动,多与欺瞒麻痹敌人紧密相连。此计成功的关键,就在于指挥员“假痴”的表演艺术如何,表演逼真,不露破绽,就能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。具体而言,就是要知而示之不知,能而示之不能,用

而示之不用,彻底迷惑敌人后再寻机歼敌。需要强调的是,“假痴”不是真痴,指挥员在表演“假痴”的同时,内心一定要异常清醒,切忌入戏太深放松了对自我的要求,得不偿失。

二是指挥员要有过人的定力。假痴不癫,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谋略。如果说“假痴”是关键,那么“不癫”就是“痴”的尺度,是此计顺利实施的保证。如果把握不好“癫”的分寸成了“真癫”,就可能因过分轻狂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,后果自然非常危险。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老成持重,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定力,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,最终后发制人。

三是指挥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出众的智慧。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,局势错综复杂,要防范对方的“假痴不癫”,指挥员就要有敏锐的洞察力,识破敌人迷惑,看清战场形势。而在识破敌计后,想要破解“假痴不癫”,又需要指挥员具备出众的智慧,能够见招拆招,掌握主动权。具体而言,可以采用三种方式:一是将计就计,发现敌人的计谋,即利用敌计谋为我所用,迫使对方中计上当;二是当面揭穿,就是在对方搞“假痴不癫”时,当场揭穿其老底;三是攻其必救迫使其出战,特别是敌方以强示弱,强守不出时,这会使敌人的“假痴不癫”之计不攻自破。



苏联底盘,英国炮

对于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小国来说,用各国的部件“攒”出来武器也是一个好办法。如芬兰在二战期间,就用缴获的苏联BT-7快速坦克的底盘,与英国的QF MK. II型114毫米榴弹炮,再加上自行设计的巨大的方形炮塔,搞出了BT-42突击炮,用以支援步兵作战和反坦克。

BT-42保留了BT-7的克里斯蒂悬挂系统,不仅可以像坦克那样用履带行驶,还可以直接用负重轮在公路上行驶,在公路行驶时,第一对负重轮可以转动实现转向。BT-42巨大的方形炮塔看似巨大,但在装满了炮弹和分离式药筒后,内部空间也非常局促。而且,旋转和俯仰要靠两名乘员配合实现,左边的炮手只能将炮塔向左旋转90度,向右旋转则需要车长进行。

徒手掀翻坦克

上世纪30年代,意大利研制了一型名为CV.33的超轻型坦克,其采用焊接工艺制造,改用铆接工艺制造的该型坦克被称为CV.35。在抗战初期曾被国民政府购买,装备了国民党军当时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师第200师,参加了长沙会战、兰封会战以及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。

CV.33/CV.35,车长3.2米,高只有1.28米,战斗全重3.2吨。战斗室左侧为车长兼机枪手,操作双联装8毫米机枪,战斗室右侧为驾驶员。战斗室地面铺有涂着防火漆的木地板,车长和驾驶员之间以皮制隔板分开。

在1935年的第二次意大利-埃塞俄比亚战争中,埃塞俄比亚人将意大利的CV.33/CV.35坦克,引到其无法转向的狭窄地形中,浇上汽油点燃坦克。由于意大利坦克重量不大,埃塞俄比亚人甚至一起用手掀翻坦克,而意大利坦克兵毫无办法只得举手投降。

(乌沃)



苏联克格勃主席尤里·安德罗波夫。



阿富汗战争期间的“阿尔法小组”成员。

“阿尔法小组”因何得名

■菜阳

在苏联和现今的俄罗斯,恐怕无人不知传奇般的“阿尔法小组”。1991年前,它隶属克格勃第7局,目前隶属俄联邦安全局特种中心,也称“A局”。“阿尔法小组”成立于1974年7月29日,起初并不叫现名。它是由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尤里·安德罗波夫根据第7局局长阿·贝斯特斯特诺夫的提议,在该局成立的一支特种分队,取俄文单词“AHTITERROR”(意为“反恐”)的首字母命名为“A小组”,由于A为希腊字母中的α(读作“阿尔法”),所以也称之为“阿尔法小组”,克格勃内部又非正式称其为“安德罗波夫小组”。至于是谁突发奇想改称其为“阿尔法小组”的,现已无从考证,但从1991年起这个名字就叫开了,据称始作俑者是新闻记者。

克格勃之所以做出成立“阿尔法小组”的决定,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国内外先后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。如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,1973年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的劫机事件。再加上1980年夏季奥运会即将在莫斯科召开,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有必要成立一支特种力量,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

恐怖主义威胁,必要时出国执行任务。“阿尔法小组”成立之初只有40余人,但其数量随后逐年增长,到苏联解体时已经拥有500人,并在莫斯科、叶卡捷林堡、阿拉木图、基辅、克拉斯诺达尔和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设有分支机构。苏联解体后,位于俄罗斯之外的分支机构,构成了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特种部队的基础和骨干。目前,“阿尔法小组”的人数估计在250-330人。

虽然成立后执行了一系列任务,但真正让“阿尔法小组”名声大噪的,还是1979年12月27日晚攻阿夫小组”。至于是谁突发奇想改称其为“阿尔法小组”的,现已无从考证,但从1991年起这个名字就叫开了,据称始作俑者是新闻记者。

不过,无论是在苏联时期,还是在俄罗斯时期,“阿尔法小组”的主要任务还是反恐。1981年,两名持冲锋枪的恐怖分子劫持了5名学生,“阿

尔法小组”成功制服了恐怖分子,而学生们毫发无损。1983年,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有57名乘客的图-154客机,“阿尔法小组”再次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解救了全部人质。在解决人质事件中,“阿尔法小组”并非单纯的依靠武力,也会采取谈判的手段。如1988年的矿水城劫持大巴事件,“阿尔法小组”就在与武装歹徒谈判了一天一夜后,促使武装歹徒放下武器,释放人质,和平解决了该事件。到了俄罗斯时期,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、别斯兰人质事件这样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,“阿尔法小组”也没有缺席,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。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就有3名“阿尔法小组”成员牺牲。

